

中國歷史文集叢刊

〔宋〕呂本中撰  
韓西山輯校

呂本中全集



中華書局

中國歷史文集叢刊

# 呂本中全集

一

〔宋〕呂本中撰  
韓西山輯校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呂本中全集/(宋)呂本中撰;韓西山輯校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9.6

(中國歷史文集叢刊)

ISBN 978-7-101-13693-7

I. 呂… II. ①呂…②韓… III. 呂本中-全集  
IV. Z424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005332 號

責任編輯:許慶江

中國歷史文集叢刊

呂本中全集

(全四冊)

[宋]呂本中 撰

韓西山 輯校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59 印張·8 插頁·1300 千字

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2000 冊 定價:19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3693-7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## 呂本中全集整理說明

呂本中是南北宋之交的著名道學家、詩人和詩論家，在思想史、文化史和詩歌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呂祖謙稱其「躬受中原文獻之傳」，是南北宋之交思想文化的重要傳承者；《宋元學案》為彰其貢獻，專設《紫微學案》以闡述其學說；他曾作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，首倡詩派之說；他提出「活法」與「悟入」說，並以其創作實踐，對南宋詩歌創新發展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。然迄無全集問世，不少著述已湮沒不存；單行於世的著述，亦往往誤為他人之作。詩論家偏重其詩論、詩作，道學家則偏重其近語錄之作，隨意刪節合併，即僅存之作，亦非原貌。為補亡羊之牢，現將呂氏僅存之作搜集整理，結集出版，以饗讀者。

此次整理，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

一、輯佚。呂氏著述，有的有目而無書。如呂氏之文，我們從陸游的《呂居仁集序》中得知，其孫祖平曾經編輯整理過，然是否刊行，不得而知。至今沒有發現傳世的刊本或抄本。此次所收《呂居仁文輯》，皆輯自各種典籍，僅釐為一卷。即傳世著述，亦多非全璧，有前人肆意刪節者，如《童蒙訓》「近語錄者全汰」。有輾轉傳抄訛誤散佚者，

亦復不少。此次整理，凡能見諸典籍者，皆輯入原著述中，力求接近原貌。在此基礎上，纂爲全集。經整理呂氏現存著作，按經、史、子、集排列，有以下十三種：

- (一)《春秋集解》三十卷
- (二)《呂氏大學解》(殘篇)
- (三)《痛定錄》(殘篇)
- (四)《童蒙訓》三卷；《輯佚》一卷
- (五)《官箴》一卷
- (六)《師友雜誌》一卷
- (七)《紫微雜說》一卷
- (八)《紫微雜記》一卷
- (九)《軒渠錄》一卷
- (十)《東萊詩集》二十卷；《外集》三卷；《輯佚》一卷
- (十一)《紫微詞》一卷
- (十二)《呂居仁文輯》一卷
- (十三)《紫微詩話》一卷

一、校勘。呂本中單行於世的著述，自宋至今，輾轉傳抄，訛奪之處甚多；刊行的版本，亦精粗各異。此次整理，儘量選取較早、較好的版本作為底本，與流傳的各種版本進行比較，擇善而從。

二、考辨。呂氏的各種著述，因其流傳渠道各異，往往在著作權上存在疑義。如《春秋集解》，自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此書作者為呂祖謙之後，即衆說紛紜，至清編《四庫全書》始作糾正，然近年又有學者舊案重提。類似問題，如《紫微雜說》、《紫微雜記》、《紫微詩話》等亦復存在，故須略加考辨，以釋讀者之疑。其考辨內容皆見諸各著述《點校說明》或《整理說明》。

本項目是在拙著《呂本中詩集校注》付梓之後，由中華書局許慶江先生提出的，在完成此項目的過程中，許先生給予諸多幫助，謹此致謝。

## 呂本中與「中原文獻之傳」(代前言)

韓西山

南宋之後，人們稱讚某位學者學有淵源且善誨後學，往往以「中原文獻之傳」美之。「文獻」一詞出自《論語·八佾》，朱熹注曰：「文，典籍也；獻，賢也。」「」通俗地說，就是歷史文化典籍和熟悉歷史文化的賢者。為何南宋特別冠以「中原」二字？一方面因為中原長期作為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賢者輩出，學術文化積澱很深，向來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根蒂和命脈；另一方面，北宋時期，作為主流學術文化思想的新儒學——道學形成於此，出現了許多有成就的道學家。當然也包含着他們不忘故國的文人情懷，表明中原雖喪，而斯文不墜。因此，在南渡的士大夫中，有不少人自覺不自覺地充當「中原文獻」的傳承者，其中，壽州呂氏的貢獻尤為突出，而在呂氏家族中，呂本中則是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。但長期以來，由於他在詩壇的盛名和朱熹等人對他的種種批評，往往被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者所忽略。下面我們從二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。

一

呂本中（一〇八四——一一四五）字居仁。壽州（治今安徽鳳臺）人。高祖呂夷簡、曾祖呂公著皆位至宰相，北宋一百多年間，呂氏可謂世代簪纓，而紆青拖紫，服冕乘軒者不啻數十百人。呂本中早年以蔭入仕，徽宗朝做過濟陰主簿、泰州士曹掾、大名帥府幹官等，召爲樞密院編修官；欽宗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；高宗紹興六年，賜進士出身，歷起居舍人、中書舍人兼侍講、權直學士院等，紹興八年，以反對和議，忤秦檜，罷官奉祠，卒。

呂本中作爲南北宋之交的著名道學家、詩人和詩論家，對於他的學術淵源和學術品格，其從孫呂祖謙在《祭林宗丞文》中說：「昔我伯祖西垣公，躬受中原文獻之傳，載之而南，裴回顧望，未得所付。逾嶺入閩，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，一見意合，遂定師生之分。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，慶曆、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。以廣大爲心，而陋專門之曖昧；以踐履爲實，而刊繁文之枝葉；致嚴乎辭受出處，而欲其明白無玷；致察乎邪正是非，而欲其毫髮不差。」<sup>〔三〕</sup>林宗丞，指林之奇，爲呂本中的弟子，也是呂祖謙的業師。因此，呂祖謙在追溯林之奇的學術淵源和學術品格時，實際上也概括了呂本中的學術淵源和學術品格。

(一) 呂本中「躬受中原文獻之傳」。

呂祖謙說呂本中「躬受中原文獻之傳」，「躬受」二字有兩層意思，一是說呂本中接受了祖上傳下來的中原歷史文化典籍。呂氏自呂夷簡起，即以儒學起家，世代高官，呂夷簡、呂公著父子都做過宰相，家藏的典籍應該是豐富的。靖康之變，多數士大夫家藏典籍遭到洗劫，而呂家卻因呂好問曾接受了金人傀儡政權偽楚的官職，受到保護。呂本中在靖康中即以父嫌休官，金人北撤之初，便攜家先至揚州。建炎元年（一一二七）五月，呂好問以擁立功，被宋高宗任命為尚書右丞，次年以嘗污偽命出守宣州。因此，建炎三年金人攻陷揚州時，呂家早已遷到宣城，此後由江西、湖南輾轉到嶺外，紹興三年回到江西，其間雖有損失，重要的典籍應該是保存下來了。二是說呂本中是在形成「中原文獻」的氛圍中親身接受「中原文獻」的傳授和薰陶。其中，呂祖謙特別強調兩個方面的內容，即「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」和「慶曆、元祐群叟之本末」。前者是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和以二程為代表的洛學，後者則是慶曆、元祐諸賢的言論和行爲。就這兩方面來說，呂本中確有得天獨厚的條件。從他的家族來說，高祖呂夷簡「以儒學起家」；曾祖呂公著自少講學，「以治心養性為本」；祖父呂希哲與程頤同學，是最先發現並師尊程頤的道學家，與程頤在師友之間；父親呂好問也崇尚道學，在北宋末年與楊時有「南楊北呂」之譽。史稱呂本中「自少講學，即聞父祖

至論，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薰陶」<sup>〔三〕</sup>。呂本中出生以後，還經歷了呂氏第二個巔峰，即呂公著爲相時期，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呂公著卒，本中已經六歲；紹聖以後，呂氏在黨爭中雖然逐步走向衰落，但呂氏之門，仍不乏元祐遺老和碩學鴻儒的過從。呂本中身歷其境，耳濡目染，不僅熟悉儒家經典和關洛學說的源流，也熟悉朝章典故和慶曆、元祐群賢的事蹟。前者代表著北宋後期儒學發展的最新成就，而後者則歸之爲呂本中經常強調的「前言往行」。他在《童蒙訓》中說：「《大畜》之卦曰：『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。』所謂『識』者，識其是非也，識其邪正也。夫如是，故能畜其德。」如果說，呂本中的學術思想有體有用，那末，儒家經典、關洛之學就是「體」，而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」就是「用」。這是構成呂本中學術思想的基本內容。

（二）呂本中對待學術文化具有「以廣大爲心」的開放性和包容性。

所謂「廣大爲心」，是說在學術思想上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，不偏執於一門一派的學說。呂氏家族，作爲宰相世家，是與趙宋王朝休戚與共的。爲了這個政權的鞏固，不得不考慮在政治上要有較大的涵容，使統治集團內部各個階層能夠和諧圓融。而這種政治上的涵容延伸到學術文化上，則表現爲開放性和包容性。他的曾祖父公著先從歐陽修講學，後又與王安石交遊，至令其子希哲師從王氏。公著官列侍從之後，所薦的官員，如孫覺（莘

老)、顧臨(子敦)，爲安定(胡瑗)門人；周敦頤(茂叔)，爲濂溪學派的創始人；程顥(伯淳)、程頤(正叔)，爲伊洛學派創始人；張戢(天祺)，張載兄，關學創始人之一這些屬於不同學派的人，公著基本不存芥蒂。他後期與王安石在政治上分道揚鑣，但在主政期間，只提出學校、科舉考試「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，毋得專取王氏」，對王安石的學說也沒有一概否定。《宋元學案·滎陽學案》說呂本中的祖父希哲「初學于焦千之，廬陵(歐陽修)之再傳也。已而學於安定、學於泰山(孫復)、學於康節(邵雍)，亦嘗學於王介甫，而歸於程氏。集益之功，至廣且大。」

呂氏家學這一優良傳統，至呂本中得到發揚光大。他說：「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。」此論最善。以言學者不主一門，不私一人，善則從之。」他還徵引陳瓘的話說：「凡爲學者，師弟之間，如善財之參善知識，可也。善財初見文殊，文殊令見德雲，告以解脫門，且云惟我知此，又使別見一知識焉。當是時也，德雲不自以我爲盡，善財亦不以德雲爲非，亦不疑德雲之言，而復見一知識，如是展轉至五十三人。故能師不以爲私惠，弟子不以爲私恩。今則不然，教者惟以我說爲然，學者惟以師說爲是，故皆卒至於蔽溺不通，而遂至於大壞也。」〔四〕

《宋元學案·紫微學案》說：

大東萊先生爲滎陽冢孫，其不名一師，亦家風也。自元祐後，諸名宿如元城(劉安

世)、龜山(楊時)、廌山(游酢)、了翁(陳瓘)、和靖(尹焞)以及王信伯(王蘋)之徒,皆嘗從遊。

這些人中,楊時、游酢、尹焞都是二程的嫡傳弟子,大體上是嚴守師說的。其他諸人則各有不同之處,劉安世是司馬光的人室弟子,主張「爲學務在力行」,「以行爲貴」;陳瓘私淑二程、司馬光和邵雍,治學的門徑博雜,他反對學者獨善其身,主張兼濟天下;王蘋先師程頤,後師楊時,但他引進禪宗「人人皆有佛性」的思想,認爲「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,廣大無垠,萬善皆備,盛德大業,由此而成。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之道,擴充是心焉」(五)。啟後來陸九淵之「心學」。呂本中對這些人的思想基本是採取兼容並包、擇善而從的態度。一般道學家視儒家之外的學說爲異端,呂本中則不同,他認爲:「學問當以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、《孟子》爲本,熟味詳究,然後通求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必有得也。既自做得主張,則諸子百家長處,皆爲吾用矣。」(六)宋代是一個儒釋道三教相互吸收融合的時代,士大夫大多耽于禪學。不過二程(包括後來的朱熹)是「人室操戈」,吸收了禪學的思想,反身又攻擊禪學。呂氏卻不同,是公開「溺禪」,呂本中尤甚,他公開宣稱佛與孔子的學說「不異」。認爲:「孔子以知止而後有定,定而後能靜,靜而後能安,安而後能慮,慮而後能得也。……而佛之教,由戒生定,由定生慧,蓋與《大學》之說無異者。孟子以萬

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而佛之說，以天地萬物皆吾心之所見，山河大地皆吾身之所有，正與孟子之說同。吾是以知佛之說與孔子不異也。」<sup>(七)</sup>他與許多高僧大德交往，公開地與他們說佛談禪，其學術思想當然包含著禪學的成分，這也成爲後來朱熹攻擊呂學的口實。

呂本中還是「衣傳江西」的著名詩人和詩論家。早年曾作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，江西詩派由此得名。一般江西詩人學詩，只局限於學習杜甫和黃庭堅，排斥李白、蘇軾，路子越走越窄。呂本中說：「讀《莊子》令人意寬思大敢作；讀《左傳》便使人人法度，不敢容易。此二書不可偏廢也。近世讀東坡、魯直詩，亦類此。」<sup>(八)</sup>「自古以來，語文章之妙，廣備衆體，出奇無窮者，唯東坡一人；極風雅之變，盡比興之體，包括衆作，本以新意者，唯豫章一人。此二者當永以爲法。」<sup>(九)</sup>又說：「《楚詞》、杜、黃，固法度所在，然不若遍考精取，悉爲吾用，則姿態橫生，不窘一律矣。如東坡、太白雖規摹宏大，學者難依，然讀之使人敢道，澡雪滯思，無窮苦艱難之狀，亦一助也。」<sup>(一〇)</sup>在要求詩人們遵守「法度」的同時，要突破思想壁壘，「遍考精取，悉爲吾用」；李白、蘇軾，是與杜、黃不同創作趣向的詩人，他認爲雖然「學者難依」，但讀了他們的詩作，可以洗滌胸中的沉滯，作起詩來，可以擺脫模式化的束縛，去除「窮苦艱難」的情狀。

(二二)呂本中倡導「以踐履爲實」的學用觀。

所有的道學家都講「窮理盡性」，「修身養性」，但往往只說不做，學用分離。司馬光說「爲學唯在力行」，劉安世說「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；說得一尺，不如行得一寸，故以行爲貴。」就是針對這種現象而言的。這對呂本中的影響很深，在《宣州新學序》中，他痛斥士人「徇空言而忘實用」，強調要有曾子「反諸其躬而求其內」的精神，「窮探力索而見之行事」<sup>(二二)</sup>。他讚揚鄭國材：「平生務躬行，聖處久收功。」<sup>(二三)</sup>他反復告誡弟子：「讀書萬卷君所聞，只要躬行不要反。」<sup>(二四)</sup>「讀書要躬行，俗事不厭簡。」<sup>(二五)</sup>「少年學問要躬行，世事營營勿與爭。」<sup>(二五)</sup>等。他的弟子周憲說：「憲紹興癸亥間，獲供灑掃於中書舍人呂公之門，公教人大要：明是非邪正，進退出處，嚴辭受取予之義，而躬行以盡其性。」<sup>(二六)</sup>在「躬行」之中，他又特別強調嚴辭受出處，察邪正是非。儒家講修身養性，不僅僅是爲了「獨善其身」，更重要的是爲了實現治國、平天下的理想。但在什麼情況下出仕，什麼情況下隱居不出，什麼情況下接受升遷，什麼情況下辭官不就，必須明辨是非邪正，把握時機，這是牽涉到個人節操的大問題。他曾說：

世之學者，忘近而趨遠，忽近而升高，虛詞大言，行不適實。雖始就學，則先言：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達節行權，由仁義行。而不知言必信、行必果、守節共學，行仁義

之爲先務也。故修其身，荒唐繆悠之說；施之於事，則顛倒悖亂而卒無所正也。

所謂「達節行權」，就是識時務，行權宜之計。這往往是一些沒有節操的人的辯詞。所以，呂本中認爲言必信、行必果、涵養節操與學聖人之道是共爲一體的，而且是行仁義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。他說：「寓言有十九，《曲禮》至三千，所要在守節，未言能與權。」<sup>(一七)</sup>他在《童蒙訓》中又說：「前輩士大夫專以風節爲己任，其於褒貶取予甚嚴，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。近年以來，風節不立，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。」下面列舉了他認爲在當時有風節的士大夫：

夏侯旄節夫，京師人。年長本中以倍，本中猶及與之交。崇寧初，召任諸州牧授學，制既頒，即日尋醫去。後任西京幕官罷任，當改官，以舉將一人安惇也，不肯用，卒不改官，浮沉京師，至死不屈。

唐文名恕字處厚，崇寧初，任荆南知縣，新法既行，即致仕。不出者幾三十年。

范文正平子夷，忠宣公之子。忠宣公當國，子夷是時官當入遠，不肯用父恩例，卒授遠地；後爲祥符尉，當紹聖初，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，與辨曲直，不屈，得罪去。

劉丈跂斯立、蹈斯行，皆丞相莘老子。登高科，以文學知名，任州縣，自處約甚，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。

汪革信民，政和間，諸公熟聞其名，除國子博士，欲漸用之，竟辭不受。謝逸無逸，臨川人。州郡欲以八行薦，堅卻之。

凡此諸公，皆卓然自立一時，不愧古人，爾來流俗不復以此爲貴矣。

夏侯旄、唐恕、汪革、謝逸在奸相蔡京當權之際，在政治上不與合作，劉跂、劉蹈不借重宰相父親權勢，范正平既不用父親的恩例，且不畏強權，在呂本中看來，這就是能夠「嚴辭受出處，察邪正是非」，具有「風節」的表現。呂本中本人也是身體力行者。宣和間，宦官梁師成用事，勢焰熏天，試圖結交當時已有文名的呂本中，本中卻拒而不答。朱熹說，這在當時是「絕無而僅有」的事。<sup>〔二八〕</sup>紹興初，他再次入朝作官，即建言：「任人當別邪正，邇來建言用事之臣，稍稍各徇私見，不主正說，元祐、紹聖混爲一途，其意皆有所在。若不早察，必害政體。」靖康間，他曾與秦檜同爲郎官，相處得很好，且秦檜人御史臺，其父好問有薦舉之力。本中爲中書舍人、權直學士院時，趙鼎、秦檜爲左右相，議論多不合，秦檜主和，欲擅相權而行其事，大肆排斥異議人士。呂本中爲陳《易經》中「同人于野，亨」之義，力勸秦檜「當以大同至公，圖濟艱難」，不可汲用親黨。秦檜不聽。未幾，任用親黨除目下，本中拒行制詞，上疏駁回。<sup>〔二九〕</sup>《哲宗實錄》成，趙鼎當除特進，本中行制詞云：「謂合晉楚之成，不如尊王而賤霸；謂散牛、李之黨，未如明是而去非。惟爾一心，與予同德。」<sup>〔三〇〕</sup>被秦檜指爲朋比大